

社會與思想叢書

第二次思想解放
與制度創新

崔之元

D62

第二次思想解放 與制度創新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崔之元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 19 590126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序

鄒 讜

一、極不尋常的二十世紀末與中國千載難逢的機遇： 「思想解放，制度創新」命題的提出

二十一世紀是人類史上一個極不尋常的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的「總體戰爭」(total war)，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更為殘酷。大戰後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不久第三國際成立。此後數十年間，國際政治圍繞這兩個互不相容的對立整體(binary opposites)而運轉。美國史家何普斯寶(Eric Hobsbawm)稱1914-91為世界史的「極端時代」。其特徵是兩個對立體或兩個軍事同盟從事「零總和的遊戲」(zero-sum game)，一方全贏，另一方全輸(totally won or totally lost)。^①

從更長遠更廣闊的視角看，二十世紀是從發動機工業轉到電子工業、機械自動控制、電子信息轉瞬傳播的時期；同時完成了從國家市場轉變到世界市場的過程。「世界鄉村」已成多國經濟必須日夕適應的現實。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世界化的市場中生存和發展。開放改革的政策既有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有不少明灘暗礁。

中國的二十世紀，更是一個秦漢以來最不尋常的世紀，經過三次性質不同的革命，在整個二十世紀中自袁世凱始到1989年

①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 29, 42-43, 391.

所有連續不斷的政治軍事鬥爭，都是「零總和的遊戲」。

二十世紀末更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世紀末。在最後的十年中，蘇聯瓦解。分解後的俄國的一部分領導人，衷心接受以美國新古典主義為理論根據由哈佛名教授薩克斯帶頭提出的「震盪治療」(Shock Therapy)改革方案，以求畢其功於一役，建立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然而事與願違，該計劃不但未能全部實行，一經提出，即引起蘇聯內戰結束後的最大的經濟危機，失業人數驟增，通貨膨脹突增數倍，整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只能依賴美國及以美國為首之世界經濟組織及經濟集團，以數百億美元或已支付或已允諾之援助，方能勉強維持。政治方面，雖經數次選舉、制定新憲法，但政局尚未能穩定。反之出人意料之外，中國安全渡過「六四」以後美國的一些經濟制裁，以靈活的政策，應付取消最惠國待遇的恫嚇，並且能夠於八、九十年代，每年取得百分之十左右的經濟增長，取得世界經濟發展的意外成績。蘇聯的潰敗與中國的成就，提出一系列的課題：美國專家根據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提出的方案何以不能行之有效？何以其一經提出即引起經濟大恐慌？「震盪治療法」的錯誤，是否僅限於操之過急？抑或是這個方案根本不適用於蘇聯？從學術的高度我們還要問：是否「震盪治療法」突出了美國新古典主義一些極度技術化的經濟學的一個最嚴重的缺陷？是否它們學說的發展，越來越漠視理論與現實的關係。^②是否美國經濟學界的權威顧問只注意他們的建議是否符合最嚴格的理論標準而忽視其他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現實？是否他們的建議甚至不反映美國自身的經濟實況和自己國內的政策？無怪美國新一代中最有成就的學者，史丹佛大學經濟教

② Robert Heilbroner and William Milberg,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授，目前克林頓總統最有力的經濟顧問史迪里茲(Joseph Stiglitz)，曾以揶揄的口氣批評這批美國顧問對其他國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他們的忠告就是「追隨我們的說法，而不是我們的做法」。^③

當然，我們必須同時強調，中國經濟雖然繼續以非凡的速度增長，但是實用主義的實踐的成功，並不意味着中國已經建立有利於長期發展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與政策。當前嚴峻的現實是中國還沒有能夠解決一些很迫切的問題，例如貪污舞弊普遍全國，國家財富資源大量流失，人口盲流全國，農民負擔過重，工人生活水平增加不多而保障大不如前，國營企業虧損未能扭轉等等。而朝野上下，包括知識分子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解決方法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甚至很少能提出略為令人樂觀的、可行的預期前景，或回答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中國目前的成就是否僅僅是走向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一個過渡階段？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按新古典經濟策劃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是否就是中國最終的目標？中國是否必須全盤否定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市場經濟是否可以控制貧富不均於一定範圍之內？自由競爭如何才可以符合正義原則(principles of Justice)？中國在美式的資本主義與傳統的社會主義之間，是否可以經過思想的解放，探索到一個合乎正義原則，保持經濟繼續迅速發展，逐漸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預設前景(vision)，並且根據這個前景建設中國自己的經濟學、政治學、人文學科，再以這些學術為基礎和經過實踐的檢驗而尋找到一條創新的道路，對全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此皆之元本書論文所提出的發人深省的問題。要解放思

③ 見本書第198頁。

鄒讜

想，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雙重的任務：既要學習研究目前西方極其複雜的、各種不同的思想、理論與實際制度、政策以及它們的歷史發展和最近的變化。同時又要以嚴肅、客觀、冷靜的態度，從歷史的角度反思傳統中國以至近七十年來的驚人成就，以及其中極為慘痛的經驗。反省之餘，更能以西方為參考，以中國現實為根據，解放思想創新制度。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既是反思的一代，更應是創新的一代。這正是之元這束論文的主旨所在。

在這個國運轉折的關頭，不少知識分子，政治上的各派，必有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觀點。中國能否渡過面前的淺灘暗礁，能否充分利用千載難逢的機會，先決的條件是：

一、在政治上，公開暫絕「全贏全輸」的鬥爭方法。

二、在學術上，摒棄過去學術從屬政治的原則。學者自己也改正過去主動引入政治力量，用政治方法壓倒不同的意見來解決學術問題的惡習。

三、尋找美好的、切實的預期前景，作為政治行動與學術研究的預設假定。

四、在目前已經存在的不同意識形態與不同的預期前景中，以合理(resonable)的態度獲得一個「重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這是之元在此已經開始但尚未能完成的工作。

二、中國與美國兩個極端不同的「例外主義」：對美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必須嚴格分析，慎重的選擇的基本原因

即使中國的學者專家對美國有很深刻的瞭解，中國也不能隨便套用整個或部分美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與生活方

式。因為在美國行之有效的思想、理論、制度、政策，不一定能適用於中國；反之在美國不能普及的思想、理論與初具規模而不能展開的制度，也有可能適合中國情況，可以採用並順利推廣。基本原因是，美國與中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總體。美國政治學家曾提出「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 exceptionalism)的論點。實際上，中國也是一個「例外主義」的國家，並且這兩個例外主義是極端相反的整體，其大相徑庭之要點如下：

第一，兩國歷史傳統極端不同，之元早在1984年就指出顧準《希臘城邦制度》一文的重要性，他說西歐文明的「基因」定型時代是希臘城邦制度，而城邦制度特徵之一是民主與法律。反之，何炳棣教授在近十數年論述與分析中國歷史文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史以前，經秦漢，到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國家家有的深層意義的「宗法基因」是一脈相承的，這個「基因」是現代化的嚴重阻礙。^④

美國的發展與西歐也不同。哈茲(Louis Hartz)早於1955年在其名著《美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中指出：美國人從歐洲移民而來，沒有長期建立歐洲式的「封建制度」，因此美國自由民主傳統自然而然地發生，階級意識較為淡薄，民間社會發達，獨立自主的團體與社區豐富多采。這是後來所謂「美國例外主義」的開端。中美兩國歷史文化截然不同，使中美兩國政府與人民不易互相瞭解，也是中國必須嚴格分析美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慎重選擇，適當應用的原因。

第二，美國在十九世紀前七十年即以購買、戰爭、移民，

④ 何炳棣：《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下）》，《二十一世紀》1996年二月號，第98，99頁；四月號，第90，100頁。

以武力驅逐印地安人的多種方式，奪取密西西比河以東洛蘭得河(Rio Grande)以北的土地，將國家疆域從大西洋沿海，擴大到太平洋邊緣。這是美國所謂的「美國命運」(American Destiny)的源起。這個新佔領的人煙稀少的邊緣地帶(frontier)，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國能比歐洲容易解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帶來的工人失業、城市貧民集居以及多種社會問題，避免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描述的英國工人及下層階級的生活，亦即馬克思早年耳濡目染的工業革命在歐洲的情況。中國情況則截然不同，中國農村中的剩餘勞力不計其數，其中一支數以百萬計的流動人口，盲目湧入人口已經過度稠密的大城市。

第三，直至本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工人沒有濃厚的階級意識，工人運動組織力量微弱。美國與歐洲工業城市不同，歐洲工人聚居於工廠附近，又多數集中於同一選舉區域，彼此不僅在工作上並且在社會生活、政治工作中，接觸頻繁。美國除少數「公司鎮集」(company town)以外，工人散居於不同的選區，因而工人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不易集中，此外政府與大、中企業對工人運動組織，控制嚴密。羅斯福實行新政以後，美國工人運動與組織，得到政府立法保護與支持，方有所發展。但七十年代以後，又逐漸衰落。目前私有企業中的只有百分之十、二十的工人加入工會。最近兩三年來雖有重整旗鼓的計劃，但是否有預期之效果，至今言之尚早。

與此對比，中國工人以工廠為單位，改革以前工廠擔負起工人居住、醫藥、退休養老等費用，並有終身職務、子女頂替制度。工廠工人自成一社區。一旦工廠單位制度破壞，失業、下崗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如未能未雨綢繆，則工人或自發或有組織的反抗行為必引起整個社會的動亂。這個預測不僅人所共知，且有學術上的根據。美國近年社會科學者研究多種使

用暴力包括革命的行為，得出的結論是：這種行為源於兩種「互相比較的損失」(relative deprivation)。第一種是目前與過去對比的「損失」，過去除官員幹部外，工人是享受利益最多的階層。目前實行的一些改革方案卻取消了不少工人原來享有的實惠。據世界銀行估計，城市居民中，可能有一千五百萬以上的人口，由於國營衰敗，裁減工人，削弱福利或工廠倒閉而陷於貧窮線下。第二種是個人與個人目前情況的對比。目前一部分人已經先富了起來，如果工人生活每況愈下，其失落感將發展成反抗行為，甚至可能進一步轉變為動亂與革命。此種情況，決非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如官僚資本家、公子哥兒、外商的經理、職員和那些少數政客，所能抵禦者，他們雖身坐奔馳轎車，手揮萬元美鈔，面對千萬工人仍然猶若「螳臂擋車，不知其不勝任也」。即有百萬雄師，或則彈指之間，煙消雲散，或則烽火四起國亡無日。因此，在改革國營工廠，實行增加經濟發展速率的種種政策之前，不能不預先安排好工人在經濟組織轉型時期中的利益，並且應當進一步提高工人在改革過程中及其後在經濟組織中的地位和參加決策與分享利益的權力。

中國農民問題，同樣如此。中國領導人從他們的實際經驗中必然瞭解上述的理論推出來的看法。

中國朝野上下對解決這個改革的中心問題，顯然也有他們的具體辦法。現成的西方理論也可修訂，用作為中國的參考：西方二十世紀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當代名著《正義論》(*Theory of Justice*，有中譯本但我未能找到，謹向譯者道歉。)提出正義制度的原則其中一條是「差異的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這條原則的第一部分是「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是能夠取得社會上處於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

益……」(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多年前我曾說過，比起美國，中國社會更符合這一條原則。這條原則在目前採用市場競爭制度、改革原有經濟體制時，也可以應用。只需添上黑體的幾個字「**改革經濟體制時**，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是能夠取得社會上處於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這條原則承認經濟改革會增加社會上經濟上的不平等，但是在多種可行的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中，中國應當採取其中的一個方案，俾能取得社會上處於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之元在這東論文中，有一篇專門介紹羅爾斯的思想，除討論《正義論》外，還指出1993年，羅氏在其新著中對他的《正義論》可用的範圍作出了明確的限定，並提出「重疊的共識」的概念，作為穩定的政治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他所討論的多種改革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的安排，比美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所提出的方案，更能夠符合「差異原則」，更能夠取得社會上「處於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更能夠給工人在工廠管理，尤其是在車間的場地上，應有的若干權力，這些方案是否為中國所接受，是否可行，雖尚未可知，但是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中國因經濟改革而再一次引起工農革命，又動一次大手術，則手術台立即會變成屍體解剖床。

第四，最根本最重要的不同是美國資源豐富、土地肥沃，大部地帶雨量水源充足，有利於資本主義式的工業與農業的發展。資本主義以個人狹義的自利為出發點，最能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因此，最適用於資源豐富而人口稀少的社會。反之，中國地雖大而物不博，耕地奇缺，往往南澇北旱，礦源分佈不良，人口則居世界之首，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三萬萬五千萬，生活有困難。中國政府最近的報告指出「全國還有六千五百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因此維持

大多數人能勉強糊口的最低生活水準是當務之急，也是發展經濟的前提，中國政府每年用於解決貧窮問題的經費約達十萬萬美元，但每年只能達到該年計劃的三分之一。此非美式資本主義在短期中可能解決的問題，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承受經濟打擊的能力不大，即使全民衷心接受馬上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只能得到比蘇聯更慘痛的結果。中國不能也不需要重複走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老路，只能另闢途徑，迎頭趕上，恢復並發揚廣大立德、立功、立言的優良傳統，極力發展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補天然資源之不足，建立一個以正義為基礎以人民幸福為目的的人本主義社會。

三、以「反思平衡」的方法，立足於中國實際情況，選擇適用於中國的西方思想制度，綜合兩方優點，相輔相成，尋求解放創新之道。

上述「美國例外主義」與「中國例外主義」的四點鮮明對照，說明中國不能隨意接受美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但是美國某些思想、理論、制度、政策卻能烘托出中國歷史上遺留的種種積弊，對解決中國的問題，很有參考價值。因此我們要認真研究美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及其在歐洲的歷史淵源，將其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對照中國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當前的現實，謹慎選擇其適用的部分，有時可以靈活變化，吸收其精華成為思想解放、制度創新的組成要素。

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冷靜反省中國的歷史經驗與分析現況，一方面肯定目前行之有效的著法與制度的優點，另一方面探索各種嚴重失誤與不合時宜的思想、理論、制度、政策的淵源，以為前車之鑑。在這過程中，每個學者對中國歷史，尤其是革命以來的成敗功過，出於自身的經驗、個人的體會，當然

有不同的見解。反省與分析之始，總是以過去的思想、理論的紛爭為出發點。因此新一代的學者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必須超越個人感受以及以往那種學術政治鬥爭黑白分明全贏全輸的作風、文風，代之以歷史與現實的複雜性、發展前途的不確定性，並以此為出發點，虛懷若谷地去瞭解彼此不同的看法。社會科學的工作者雖不可能達到完全客觀的境界，但是學術畢竟還是有學術的標準，以學術的方法去分析中國歷史是我們學者的首要任務。

選擇、應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去分析中國問題時，也應當堅持學術態度與學術標準。中國學者應當開卷有益、博覽羣書，深入瞭解西方各派不同的學說，然後再對照中國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謹慎選擇適用於中國的部分，然後再從這種思想理論的角度去進一步分析中國情況，審定其思想理論是否真能增加我們的瞭解、解決中國的問題。反過來又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去檢查西方的思想理論，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制度、政策也要用同一方法去分解、選擇、審定與靈活採用，在中西方相互比較，彼此引證，反複思索中，求得「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然後再將這些達到「反思平衡」的經驗性的命題(empirical proposition)，用社會科學嚴格的方法去檢證(verification)或證偽(falsification)，其中規範性的命題(normative question)與道德倫理問題應當以合理性(reasonableness)，合乎人性(humaneness)及正當性(legitimacy)的標準鑑定，其中有關制度政策的結論，除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標準去衡量外，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最後才能將這些經得起考驗的個別的結論，綜合成一個思想理論、制度政策的體系，作為建立新中國的基礎。

之元在介紹羅爾斯思想的文章中，曾介紹「反思平衡」的方法，不過羅爾斯的「反思平衡」是用於尋求正義原則的方

法，我在這序言中，借用這個方法的大意，應用於討論如何結合中國與西方的思想、理論、制度與政策的某些部分、去解決中國問題。之元這束論文可以用來作討論這個方法的一個例子。之元有些論文在形式上或以討論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思想理論為開端，或以西方或美國的理论、制度、政策，作為他的結論的根據。但是他的論述始終圍繞着中國思想界的討論與中國的現實，就算是專門討論西歐和美國的思想、制度的時候，他也是「扎根於中國現實」。

在本文以下的各節中，我將舉出之元應用「反思平衡」方法的實例，在這裏我只要指出之元在這一束論文中，提出不少個別的結論，這些結論或針對中國目前面對的最迫切的問題，或提出中國長期制度建設的基本原則與具體形式。他既從中國歷史着眼，也引用美國理論界最新的學說、深奧的理論，最近的制度方案，去對抗美國主流派的經濟學與一般人對資本主義的庸俗的瞭解。他的論文中的個別結論，都可以作為一本學術專著的假設(hypothesis)或主題(theme)，其中的「經驗性命題」還需進一步以具體事實和數據去檢證；每一個「規範性的命題」也必須更深入的討論。之元這些個別的結論互相支持；各種深淺的層次、彼此呼應，一個重組的系統已隱約可見，但仍需明確地完整地論述。完成這一系列的尚未完成的工作是之元自己在這束論文中提出的今後的任務。

四、破立並舉的創新：超越當代中國的「兩分法」，反對「制度拜物教」在方法論上的深層意義

思想解放、制度創新的出發點、貫徹全書的一條線索，就是「超越（中國）傳統的兩分法」，之元說：「各種傳統的兩

分法——私有/國有、市場/計劃、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改革/保守——似乎失去它們的刻劃現實、想像未來的能力」。這種兩分法，強調「非此即彼」。要明白之元這個提法的重要性，我們就必須指出：這個近幾十年的思維方法，同時也是中國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它與中國現實政治互為因果。中國二十世紀的致命傷是「全贏全輸」、「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形式。這個有時不可言宣的行動規則，更多時候是旗幟鮮明的實際行動的方式，也就是博弈論中的「零總和」遊戲的規則(rule of the game)。其結果比「囚犯兩難困境」中，兩方均採取不合作的「支配性的策略」(dominant strategy)的得失遠為重大。在人類互動行為中，各種不同的博弈與其中不同的規則，比有形的、有文字根據的制度，更有決定作用。二十世紀中國的「零總和的遊戲」是在這世界史的「極端的時代」一個最持久、連續不斷的慘痛的悲劇。這個在意識形態上、在政治中，非此即彼的「兩分法」，用最淺顯的社會科學的說法，就是「兩極分化」再加上「最高權力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一元論的產物。暫絕這種兩分法，不僅是開闢創新的空間的必要條件，並且是破除「全贏全輸」作風、文風的思想上的出發點。

之元兩分法的概念是針對中國目前現實而言而不是套用西方學說的兩分法的結果。西方的兩分法基本上是學術理論上方法論上的概念，並無中國二十世紀兩分法的政治意味。之元超越兩分法的道路，不是套用西方理論，而是來自中國哲學家龐樸的「一分為三」的說法，並且也兼引老子「三生萬物」的思想。之元在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同時，存其精華，選擇其中一部分，作為自己思想理論的出發點。同時參照法國人類學家大師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三元模式」和法國年鑑學派的雅克·高夫的「第三領域」的思想與龐朴教授「一分為